

马歇尔调停与拟议中的美国对华五亿美元贷款

胡 美

(南京大学 历史系,江苏 南京 210093)

[关键词] 马歇尔调停;五亿美元贷款;美援;中美关系

[摘 要] 马歇尔在调停中国内战之初取得了重大进展。为了维护当前的调停成果,马歇尔赴美,为国民政府说服了进出口银行应允为其提供五亿美元贷款。然而,就在这一贷款签字前夕,中国内战和调停局势发生了变化,破坏了提供美援的条件,为了把握谈判的节奏,美方冻结并最终终止了这批贷款。

[中图分类号] D829.7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08)09-0063-07

Marshall Mediation and the U. S. 500 Million Dollars Loan in the Planning to China

HU Mei

(History Department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Jiangsu, China)

Key words: Marshall Mediation; 500 Million dollars Loan; American Aid; Sino-American Relations

Abstract: George C. Marshall made great progress in mediation of Chinese civil war in the early mediation days. Marshall returned to Washington and persuaded the Export-Import Bank to provide 500 million dollars loan to Nationalist Government in order to maintain the existing achievements in the mediation. But, on the eve of going into effect, something happened to the Chinese civil war and the mediation, destroyed the condition of American aid, U. S. government froze the 500 million dollars loan to have the initiative.

马歇尔调停中国内战之初,美国进出口银行准备向国民政府提供为数五亿美元的贷款。这一拟议中的援助是美国当时对华援助中拨款额度最大的一笔。由于时局的变动,这一贷款在即将完成签字手续之前被冻结,未能兑现。五亿美元贷款由于其贷款额度之巨频频为后人提及,但由于它并没有付诸实现,因此又为研究者所忽略。实际上,无论是五亿美元贷款的提及,还是其后的冻结以至终止,都与当时中国国内外政局紧密相关。结合这些背景,本文将深入探讨马歇尔调停与五亿美元贷款之间的内在联系。

万~5 000万美元的长期贷款,购买国民政府急需却不能从剩余物资中获得的物资,如交通与通讯器材等;3. 当中国的政治与经济情况有所改善,适合于大量接受贷款援助,进出口银行将在逐项审批的基础上批准该项贷款。^{[1](p911~912)}

显然,这些条件都与马歇尔当时在华使命的成败密切相关。1945年12月,杜鲁门在派遣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来华时,就曾经笼统地提出过美国的援华条件。在给马歇尔的训令中,杜鲁门表示,“一个强大、统一而民主的中国”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为了美国 and 联合国最重大的利益,中国人民不应放过任何机会,迅速用和平协商的方法结束内部的不和”。为了完成这些任务,他要马歇尔“以最坦白的言辞”与国民政府谈判,并将美援与中国的和平联系在一起,声称“一个为内争所分裂的中国”不适于美国以贷款形式或技术援助形式的经济援助,也不适于美国的军事援助。^{[2](p192~193)} 在抵华的最初3个月,马歇尔在调停中获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先后达成或促成了停战协定、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中国一度出现了和平的曙光。为此,马

抗战结束后,国民政府向美国提出了一项为期3年、为数20亿美元的贷款计划,其中首期贷款要求为5.6亿美元。1946年1月,美国“全国顾问委员会”(National Advisory Council)在讨论了这一贷款要求之后,向国民政府提出了获得这一贷款的三项条件:1. 等到中国政治与经济局势好转,再制定大规模对华财政援助计划;2. 根据马歇尔将军的建议,进出口银行将提供3 000

歌尔传记作者称他“给一个显然沉沦于多年战争和混乱的国家带来了停战与协议的希望”^{[3](p104)}。一向对中国和平希望悲观的在华美军司令魏德迈(Albert C. Wedemeyer)也作了如是评价:“真是惊人的成就,我真正怀疑在世界上是否有任何其他的人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做到如此之多。”^{[4](p233)}

然而,看似硕果累累的调停,基础并不牢固。在停战问题上,停战协定达成后,蒋介石认为,当前情势对政府极为不利,尤其是在进占赤峰问题上的中途停止,造成了军事上的失算。^{[5](p13)}在政协决议的问题上,政协草案对蒋介石的权力予以极大的制约,引起蒋介石的强烈不满,称它“不仅误事,且是以召亡国之祸也”^{[6](p71)}。对于马歇尔在政协会议上的各种政治安排,蒋介石耿耿于怀,但“国际关系复杂,我们政府不能不委曲求全,以谋国内和平统一”^{[7](p1820)}。在1946年3月初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谈到政协协议时,他竟然提出要“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同时还做出数项决议,旨在推翻政协宪法草案规定的各项民主原则。^{[8](p824)}蒋介石对马歇尔的不满和怨恨同样存在于军队整编上。整军方案达成后,他在日记中写道:“与中共商定统编其所部为18个师之方案,业已签字,此为政府最大之损失。”^{[9](p37)}

显然,蒋介石在谈判中所做出的让步,既是以中共为代表的进步力量斗争的结果,也是为了争取援助而向美国压力妥协的结果。马歇尔对此心知肚明,现有的诸多调停成果是建立在大规模美援将源源而来的基础之上的。要切实维护现有的调停成果,向蒋介石兑现现有的美援势在必行。

与此同时,美苏在东北的利益之争,使得美国向国民政府提供援助成为与苏联斗争的重要武器。为了在东北获得经济利益,同时找到在中国北方的军事缓冲地带,苏联坚持与国民政府展开关于东北的经济合作谈判。为防止美国势力深入东北,苏联坚持在东北取得对重要工矿企业的垄断性的合伙经营权。在美方看来,苏联此举是“蓄意的破坏和盗窃”,旨在“垄断满洲的工业和经济”,将“严重影响美国的商业利益和门户开放政策”。^{[10](p1100-1102)}在中苏经济合作谈判取得进展前,苏联却开始拆除宁嫩铁路的“钢轨枕木及附属品”,以及沈阳附近工厂的“机械设

备”。^{[11](p243)[12](p673)}美国担心,中苏两国关于东北工业的谈判,将导致美国失去在满洲发展经济关系的平等机会,在今后的贸易中居于不利地位。随着苏联对东北的利益诉求的增多,美苏在东北问题上矛盾骤增,美国通过拉拢国民党而增加与苏联对抗筹码的愿望渐涨。马歇尔考虑将东北问题纳入到美国对苏战略的轨道,试图采取行动拉拢蒋介石,使其按照美国的设想,实现美国的愿望。2月9日,马歇尔向杜鲁门表示,美国在中国的目标必须是“尽快使中国统一起来,以便消除它目前在面临苏联秘密攻击时所处的软弱地位”。他同时表示,“在这件事上,我们的政府必须马上为中国做更多的事,而不仅仅是向中国提出建议”。^{[10](p426-429)}这里的“更多的事”已不再限于承诺中的援助,而是付诸实现的现实中的美援。

对苏联扩张的恐惧、对调停成果毁于一旦的忧虑以及对内战爆发的担心,导致马歇尔将更多的希望寄托在美援上。他冀望通过美援,确保蒋介石在美苏之间选择美国作为合作伙伴。早在2月底,在一封写给他的战时助手弗兰克·麦卡锡(Frank McCarthy)的信中,马歇尔就表示,他要在3月中旬回华盛顿一趟,“联系贷款、剩余物资、运输船等等事宜”^{[3](p107)}。

3月12日,在完成了对中国工作的安排后,马歇尔带着特殊的使命回到了华盛顿。在华盛顿短短的几十天时间里,马歇尔几乎将所有的时间“都花在和政府官员们商谈关于贷款给中国问题上,以及关于以船只和剩余物资的形式援助中国的问题”^{[13](p89)}。他的主要活动有二:一是力争在美国与盟国清算战时债务时,对国民政府给予特殊优惠待遇;二是为五亿美元贷款开绿灯。3月16日,在华盛顿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马歇尔呼吁,中国是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统一和经济问题对美国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而中国的和平需要其他国家的援助,“美国在当前是最能够给中国以援助的国家”^{[3](p115-116)}。他还告诉美国人:“中国正努力团结,亟需全世界之合作,美国应积极援助中国。”^{[12](p689)}20日,他向美国对外贷款顾问委员会建议,向国民政府提供信用贷款。^{[5](p79)}马歇尔的对华援助政策实际上与美国当时的全面援华总方针相吻合,因此,他的求援呼吁得到了总统杜鲁门的热情支持,杜鲁门“责令财政部在各方面都和他合作,并达成了

一项协议,立即给予中国五亿美元贷款^{[13](p90)}。在马歇尔的极力呼吁和努力争取以及杜鲁门的支持下,进出口银行同意与中方就五亿美元贷款事宜进行谈判。

马歇尔在华盛顿的求援刚见起色,他的调停成果却遭受了严峻挑战。在向东北派遣军调部停战执行小组的问题上,蒋介石诺而不行,导致战事在东北的蔓延。马歇尔不得不多次敦促他在华的调停代理人吉伦(Alvan C. Gillem),尽快派遣三人小组进入东北,强调“必须大力促成此事,不能再拖延了”,并极力要求吉伦亲赴东北,以便控制东北战事的南蔓。^{[10](p576)}张莘夫事件后,中苏关系再度微妙化,自3月7日始,苏军在未通知国民党当局的情况下,突然自南满撤军。中共军队迅速占领了南满大部分工业区,蒋介石大为震惊,加紧了对东北的军事部署,准备赶在三人小组到达东北前掌握东北局势的主动权。对此,中共也调整策略,准备以军事上的进展作为谈判的后盾。

局势的复杂化和战事蔓延可能性的增加表明,美国提供援助的条件并未完备,马歇尔的求援引起了中共方面的高度关注。3月20日,周恩来警告在美求援的马歇尔,中国当前局势尚不稳定,和平仍未达成,尚不具备接受美国财政援助的资格和条件。实际上,对于马歇尔的援助意图,早在3月3日,周恩来就向吉伦提议:“最好在改组政府、修改好宪草后实现,否则现在借款会使顽固分子更嚣张,政府改组更困难。”^{[14](p653)}

4月4日,周恩来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列举了大量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有人在破坏政协决议,破坏停战令;并正告美国,如果不能在政协决议的基础上组成一个统一的联合政府,美国便单方面给国民政府以帮助,特别是财政上的帮助,“那只会增加中国国内的不安,便利一党独裁”^{[14](p655)}。

东北局势已经剑拔弩张,远在美国的马歇尔对中国局势的严重性也深有体会,但在马歇尔看来,中国国内形势越是紧急,越有必要获得美援以对蒋介石发动战争形成掣肘,这样既可以为他的调停筹得一威慑筹码,又能增加蒋介石扩大战事的机会成本。因此,马歇尔不顾中共的抗议,依然在加紧呼吁美援,为援助国民政府继续奔走。

对于蒋介石在他离华后破坏谈判的行动,马歇尔不无担心,临行前他致函蒋介石,向其强调此行的目的。他表示,无论如何,总统将尽其所

能地支持中国的统一;美国将向国民政府提供金钱、物资和人员方面的慷慨援助;美国之行“对于使国会和公众的意见与上述政策保持一致具有重大价值”^{[10](p513)}。言下之意,这段时间内国民党军队的表现,将直接影响到能否获得美援,以此威慑蒋介石的好战之举。

在美期间,内战危机的加深和各种负面舆论给了马歇尔巨大的压力。为鼓励蒋介石配合吉伦在中国的调停,他将在美求援的进展随时向蒋通报,冀望以五亿美元贷款迫使蒋态度温和化。3月17日,围绕着地方政权地位的问题,国共谈判取得了进展。得知这一消息的马歇尔,立刻让吉伦转告蒋介石关于美援的进展,“我已经与总统和国务卿、进出口银行行长、副国务卿以及助理国务卿克莱顿(William Lockhart Clayton)探讨了有关中国事务。周三,我将会见全国顾问委员会,就国际货币和财政问题进行会谈,这次会谈应该可以为有关中国的财政和物资事务的早期谈判开辟道路”^{[10](p576)}。马歇尔相信,美援的进展将激励蒋介石的和平让步。

马歇尔的援华政策虽然得到了杜鲁门的全力支持,但贷款并不为所有美国政府人士和进出口银行所认同,中国国内的严峻局势让他们在贷款问题上忧虑重重,马歇尔向蒋介石坦言,“政府人员对于政治上之困难情形必须深加考虑,而已负责办理借款之进出口银行董事为尤甚”,这些都是蒋介石获得美援的障碍。为了增加获得美援的几率,马歇尔还在敦促中国政府,“就逐步稳定货币采取令人满意的措施”,以满足进出口银行的要求。^{[6](p103)}

为了克服美国国内的障碍,马歇尔还在政府上下积极疏通,逐一拜会有关部门,出席参众两院的有关委员会会议,召开记者招待会,筹措美援。正如他自己所言,“我能为中国做的,我都做了”^{[6](p104)}。在马歇尔的努力下,进出口银行最终应允了向中国提供五亿美元贷款。3月28日,马歇尔通知蒋介石,考虑到中国已经在走向和平、统一与恢复经济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美国政府准备对中国的建设与发展给予援助。^{[11](p971)}31日,在马歇尔的授权下,麦金利代表向蒋介石通报了五亿美元贷款事宜,同时附上了拟于报纸上发表的新闻稿、拟作为进出口银行允诺借款的通知书。电文表示,鉴于中国在“和平、统一及经济复兴已获长足进步”,进出口银行决

定,在1947年6月30日前,向中国政府机关以及私人企业提供五亿美元借款,助其向美国采购各项原料及配备器材,以及雇佣美国人员从事经济复兴与建设。^{[12](p828)[6](p105-106)[1](p971)}此时的国民政府离五亿美元贷款仅有一步之遥。

二

既然当前的全面援华政策将继续下去,那么美援将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得到体现。收到五亿美元贷款电文的蒋介石,与其说是兴奋,还不如说充满了紧张与疑虑。作为自抗战时期便与美国有美援往来的元首,蒋介石对各种美援了如指掌,他明了,美国国会的直接拨款,在全面内战爆发后,拨款的拨用所受限制最少,也最为便利。进出口银行贷款就不同,其用途受到严格的限制,并且审查非常严格。因此,蒋介石一直都在期待国会的直接拨款,对于进出口银行的借款,他担心“束缚我应得之权利”。因为不愿承受进出口银行“苛刻之约束”,他担心即使签署了借款协议,也没有动用借款的机会。他授予宋子文在“不可使之(指马歇尔)灰心”的原则下,对贷款进行协商修改,尽可能地让国民政府承担较少的义务。如果经过研究论证,宋认为“此款暂时不必成立或不可签订,则不如与马歇尔婉曲商谈,请其先回华后再谈亦可”^{[5](p95-96)[6](p107)}。

经过研究后,宋子文等人认为,“和平统一”与国民政府当前奉行的武力政策、即将发动的全面内战以及国民党所追求的政策目标相违,要求将“和平统一”改为“中国已在改善政治和经济条件方面取得实质进展,这是对恢复经济至关重要的条件”;另外,他们认为,贷款的逐项审批原则,将大大限制运用贷款的主动权,要求对该项原则予以修改,要求将部分贷款供中方“灵活”掌握。^{[1](p973-974)}4月2日,宋子文将这一要求告知魏德迈,由于中方购买劳力和建筑装备花费较多款项,可能导致购买机器设备的款项不够,因此,希望“所得到的贷款更富弹性”,得到一部分以现金形式出现的资金,自主支配购买国民政府所需要的消费品或原料。^{[1](p972)}

得知中方的这些要求后,马歇尔首先否定了用进出口银行贷款购买消费品的可能性;至于所谓贷款的弹性,则“可能破坏整个借款计划的统一性”^{[11](p972-973)}。宋子文不顾马歇尔的澄清,在回复中提出了几项要求:首先,要求进出口银行

的借款在以下两方面更具弹性:一者,贷款可以为任一项计划提供资金给付;二者,贷款可自主购买在中国销售的商品或原料。其次,要求对进出口银行草案的有关措辞予以修改。^{[1](p973-974)}当马歇尔将这些意见与国务院、财政部以及进出口银行的官员交流时,进出口银行拒绝国民政府用其贷款换取国币或购买消费品,也不赞同由国民政府自由支配该项贷款。^{[11](p974)}

4月4日,美国国务院正式通知驻华使馆,进出口银行理事会建议立即启动五亿美元贷款谈判。应国务院的要求,4月9日,魏道明、王世杰与远东事务助理约翰·文森特(John Carter Vincent)、副国务卿迪安·艾奇逊(Dean Gooderham Acheson)等人在华盛顿讨论五亿美元贷款问题。魏道明和王世杰再度提出修改贷款草案的要求时,遭到艾奇逊的强烈反对。艾奇逊指出,为安排贷款,美国已付出了相当的努力,他谴责国民政府“对草案的修改不符合贷款的实际情况”,并建议“最好在当前草案的基础上同意”。王世杰再次提出运用贷款的弹性时,得到的是和马歇尔相同的答复。艾奇逊重申,这是进出口银行处理贷款问题的原则,他同时强调不会将中方的请求转告银行。当魏道明向艾奇逊询问交换协议的时间时,艾奇逊当即给进出口银行负责贷款事宜的马丁打电话,要他安排中国大使与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莱顿的会谈。散会后,克莱顿告诉文森特,贷款计划已经安排妥当,很快便可交换协议。^{[11](p975-976)}

虽然美方拒绝了中方的一些修改请求,但并未影响到贷款的进展,协议的签字在即。国民政府对于其所提要求频频被拒心有不甘,在援款数额上提出了更高要求。国民政府财政部曾对外交部表示,重建战后经济,支付所欠外债,“决非此5亿美元所能应付,至少似宜以20亿美元为目标”。财政部也表示:“此项大借款为弥补抗战损失,维持国际和平,开发远东经济,发展国际贸易,裨益甚大,而受其惠者,非独我国,与美国关系亦巨。”在国民政府看来,美方提供更多的援助,不仅裨益中国局势,而且有利于美国在华商业。^[15]

五亿美元贷款难填国民政府对美援之欲壑,也无法束缚住蒋介石的战争野心,拴住国民党军队的战车。伴随着贷款的顺利进展,中国国内局势非但未得改善,反而愈加恶化。贷款与其说是

在为马歇尔的调停筹措资本,还不如说是在为蒋介石发动内战添柴加油,助长了中国局势的恶化。

中美展开贷款谈判之际,也是中国东北内战开始之时。由于东北内战的爆发,参与军调工作的美方人士不得不要求马歇尔尽快返回中国。罗伯森(Walter S. Robertson)于4月6日告诉马歇尔:“形势如此严峻,恶化的速度如此之快,为防止您的使命遭致彻底覆亡,您有必要速返中国。”^{[10](p735-736)}目睹和平大厦将倾,马歇尔“不能坐视冲突再度恶化”,于4月6日催促吉伦亲往满洲,“采取强力措施推动双方的全面谅解”,任何拖延都将给东北局势带来致命的后果。为推动谈判的有效进行,他甚至要求吉伦亲往东北参与调停,冀望于吉伦的身份和威望使谈判有所进展。^{[10](p737-738)}尽管如此,形势恶化的程度还在加深,吉伦在4月8日的报告中告诉马歇尔,“自您离开开始,三人小组在满洲的问题上就已经完全陷入了死结”^{[10](p740)}。有鉴于此,吉伦提议,从当前所申请的美援着手,向在调停中拒不合作的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对于美国在借贷计划下的特定借款给以经济上的限制,即便在这一借款计划公开后,当出现处理与中共关系及军事协定拖延的情况下,也应该给以限制”^{[10](p744)}。

三

对于巨额美援即将到来的时刻扩大军事冲突的做法,王世杰颇感不妥。4月8日,王世杰在他的日记中写道,“美国国务院允以美金五亿美元信用借款贷我,购买物资”,但由于“今日中共与政府间之冲突复起(东北方面有军事冲突),美政府为此决定,自系由于马歇尔之主张。唯美政府尚未发表此事”^{[16](p299-300)}。然而,王世杰的提醒并未引起蒋介石的收敛。4月9日,蒋介石在接见美联社记者时,表露出强烈的反共反苏情绪,认为“中共和俄共、法共或者其他国家的共产党没有任何区别”,“当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共产党问题”,在今后数年,共产党问题将更加严重;他表示决心消灭中共,并鼓吹美国应对苏联采取强硬态度。^{[6](p475)}这一充满着鹰派色彩的谈话充分表明蒋介石的求战取向,引起中国舆论界的强烈反响。在4月11日的记者招待会上,周恩来指出,国民党大规模进攻,将使中国再度陷于全面内战,并表示“在政治与军事问题没有完全获得解救前,中共将拒绝参加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

会”^{[14](p657-658)}。

蒋介石的前述讲话,与其说是破灭了中共和平谈判的希望,不如说已彻底摧毁了马歇尔前期调停的成果。与和平前景同时黯淡的是五亿美元贷款前景的黯淡。蒋介石的表态,实际上意味着曾经在马歇尔影响之下达成的短暂和平业已消失,获得五亿美元贷款的依据,即“中国已经在和平统一和经济复兴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进步”^{[11](p980)},已然成为一个不实之辞。蒋介石诉诸武力的战争行为不仅挑战了美国提供美援的依据,而且是对杜鲁门12月15日声明的援华原则,即“中国走向和平团结”^{[21](p193)}的违背。

对于蒋介石的所作所为,马歇尔愤愤不平,责怪蒋不该在那样的时机发表那样的谈话,“扼杀”了他力图助蒋的努力。^{[11](p980)}在这种情形下,马歇尔刹住了五亿美元贷款的车,决定“对谈判做出一些改变”,贷款在马歇尔的援华策略中所扮演的角色,由此前对蒋介石在调停中的配合所给予的奖励,转而成为向蒋介石施加压力的杠杆。

为将中国局势发展的节奏控制在自己手中,马歇尔决定“不再与进出口银行的董事们正式接触,也不主张对其他感兴趣的机构做出同样的行动”^{[11](p975)}。美国政府给予了马歇尔坚强的后盾和强力支持,为了确保美国所给予的每一笔援助都成为马歇尔在调停中的筹码和讨价还价的武器,它对马歇尔的决定给予了无条件的支持。在局势进一步紧张化的前提下,美国政府非常清楚,“在马歇尔回国之前对贷款给予宣布和做出肯定的承诺,将剥夺他在最需要这个武器时的最有力量”^{[11](p980)}的武器,将“严重削弱他扭转当前局势,将两党扳回到他们原来位置上去的能力”^{[11](p980)}。詹姆斯·戴维斯(James C. Davis)在给马歇尔的一份备忘录最后的附言中表示,“关于五亿美元贷款的进一步行动将有待您来自中国的建议”^{[11](p979)}。这一附言充分表明美国当前的援华态度:其一,五亿美元贷款事宜将暂时悬置;其二,对贷款采取何种态度,将等到马歇尔回到中国再作决定;其三,贷款的决定权给予了马歇尔,马歇尔可以根据中国的情况,配合调停形势,操纵五亿美元贷款。美国方面将五亿美元贷款的予夺大权交给了马歇尔,使之成为马歇尔今后调停中国局势的重要工具。这就意味着,通过暂停提供这一援助对蒋介石的武力政策实施了制裁,这笔并未签字的贷款成为马歇尔进一步调

停的重要砝码和现实的悬赏之物。

美方态度的转变还没有来得及通知国民政府,国民政府在美负责求援的官员对此便有所觉察。4月12日,时任驻美大使的魏道明在会见马歇尔时发现,在贷款问题上,马歇尔“促成此事之意,似不如以前积极”,“各方面均以我所提修正文字改变原文精神,未能同意”^{[5](p105-106)[6](p112)}。但对于美国方面态度发生转变的原因不甚明了,由此产生了种种猜测。魏道明推测,马歇尔态度的转变,“当与中共最近捣乱情形有关”,将责任推之于周恩来及民盟等党派所从事的“破坏”活动。^{[5](p105-106)[6](p112)}蒋介石宣称,“美国与我国之目的相同,成败亦复相关”,美国在援华上的这一态度“实属错误”,他期待“马歇尔果能听我忠告,而改正其态度”^{[6](p112)}。

实际上,包括魏道明在内的国民政府高官们并未把握美国提供援助的宗旨,自1945年年底,美方便强调,美援是“依据1945年12月15日美国政府所阐明的政策而决定”的^{[2](p703)}。这一声明强调,只有“中国局势之统一”,“美国保留协助中国人民达到和平及经济复兴之政策”的情况下,美援才会提供给中国。^{[2](p193)}贷款的顺利进展也有赖于马歇尔在美强调中国在和平统一等方面所取得的成果,蒋介石的讲话实际上将中国和平统一表象都揭穿了,提供美援的最后理由业已消失。于是,“对华进出口银行的五亿美元贷款的承诺和报纸的公布推迟了,推到马歇尔回到重庆,这样他有机会对形势进行重新评估”^{[11](p980)}。

对于美方的撤援行为,国民政府措手不及,为挽回损失,匆忙做出紧急回应。与王守竞详细讨论后,驻美大使魏道明最后决定,为获“早成之望”,做出相应的让步,放弃此前所提一切条件,“接受原案”,并开始积极在国务院和进出口银行进行活动。但尽管他们与副国务卿艾奇逊、贷款方进出口银行的主席马丁进行了交涉,均“未有结果”^{[6](p112)}。美国驻华使馆于4月13日正式提出建议,贷款事宜暂缓承诺和宣布,待马歇尔返回中国后再说。^{[11](p980)}贷款签约之事功亏一篑。

五亿美元贷款被冻结两个月后,国民党军队向中原解放区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开启了全面内战的序幕。贷款被冻结后,马歇尔的调停继续了9个月时间,在此期间,内战的规模在不断扩大,“和平统一”的援华条件也未产生变化,五亿美元贷款遂被搁置。随着内战范围和烈度的进

一步扩大和升级,国民党军队消耗了巨大的国内资源,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危机,美国在华利益面临威胁,五亿美元贷款曾一度被重提。为重新获得这笔拨款,围绕着重新指定贷款的用途和延展贷款失效期限等,国民政府曾展开了艰苦的外交努力,但终因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危局、美国对华战略的调整以及对华军火禁运令于1947年5月的解禁等原因,五亿美元贷款最终于1947年6月30日期满失效。

四

五亿美元贷款是美国战后全面援华政策中的一项重要举措。虽然不是专为马歇尔调停设计的一项援助计划,马歇尔及马歇尔调停却在这一款项的发展上产生了极端重要的影响。具体说来,五亿美元贷款是马歇尔在调停取得预计效果,并对调停前景充满希望的前提下,为保障现有调停成果、推进下一步调停而浮出水面的一项援助;而其冻结又与美国政府推进马歇尔的进一步调停息息相关。

无论是马歇尔的回国求援之举,还是对拨款的冻结,马歇尔都在企图获得调停中国内战的重要武器和道具,试图以美援的进退,把握对中国局势的主导权。美援均旨在帮助马歇尔在进一步的调停中获得进展,即作为迫使拥兵百万的蒋介石接受和平方式解决中国问题的筹码,并为新美援的运用创造较好的环境。不过,这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决策者的一厢情愿。实际上,美国政府和马歇尔高估了这笔援助的重要性。对于正扩军备战的国民政府来说,五亿美元贷款,虽然确为一笔为数不小的援助款项;而对于扩军备战任务业已基本完成的国民政府而言,其意义却大相径庭。蒋介石对于五亿美元贷款的态度已经对当时国民政府需要美援的急迫度做出了答复。在得知这笔贷款后,蒋介石的态度不再如此前热情,只是轻描淡写地向宋子文表示,“此款于我完全为对内政一时之作用,如果此借款成,则政局当可比较稳定,关于国民大会与改组政府,皆可如期完成,至少亦可增加美国协助我政府形式上之效用”^{[6](p104-107)}。蒋介石的这一态度注定了马歇尔将无法获得挟持蒋接受调停条件的筹码,也将无法改变他在谈判中微不足道的地位与分量。

一向对美援充满热情的国民政府对美援失去兴趣却源于美援本身,因为自二战结束后,美

国向国民政府提供了远较二战时期更为庞大的援助。伴随着日本的战败和东亚战略真空的出现,美国准备将中国这个战时盟友扶植成为战后稳定东亚秩序的重要平衡力量。为完成这一使命,它向中国提供了最大份额的战后救济,三次延长本应随着二战结束而终止的租借援助,为国民党军队提供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空运,帮助国民党将其数十万军队由西北、西南等后方阵地运往东北地区,陆续兑现了二战时尚未来得及提供的各项援助,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和军事援助协定。通过美国的全面援助,到1946年4月,国民政府及其军队迅速获得并积累了极大数量的美援武器和装备,快速完成了对东北的内战部署工作,对美援的兴趣随着备战的完成而逐渐减弱。

蒋介石不得不对美援与内战作一番权衡,而实际上,比较起既定的内战战略来,五亿美元贷款根本无足轻重。由此可以判断,美援对于蒋介石内战的助长已经完成,即便此刻不再提供援助,国民党军队也有足够的物资发起内战,任何政策都无力挽回国民党的内战意志。既然拥有充足的美援物资进行内战,那么贷款是否提供对国民党的内战战略影响并不大。

既然内战战略已定,是否交换贷款协议并没有实质上的意义。国民政府在贷款问题上的要求虽然带来了时间的拖延,时间上的拖延虽然暂时搁置了协议的交换,但这些都无足触及美国援华之本质,都不构成美国冻结美援的内在原因。即使贷款协议顺利签字,蒋介石也不发表那番讲话,贷款也难以付诸实现。其根本的原因在于,蒋介石的内战政策与马歇尔所肩负的维持和平统一的调停使命背道而驰,蒋介石无法永远掩盖其内战意图,马歇尔也无法实现其所期待的和平。

五亿美元贷款的冻结是美国战后全面援华政策的第一次震荡,是美国全面援华政策开始变化的标志。从根本上说,美援的冻结反映了国民政府与美国之间存在的根深蒂固的目标差异。蒋介石在利用调停幌子进行的内战,既给马歇尔的调停使命带来了极大的失败因子,也极大地危害了美国所追求的在华利益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动用了维系中美关系的重要纽带——美援,以抗议国民政府在调停中的不合作和危害其在华利益的行为。从表面上看,美援的中止似乎使中美之间的冲突发展到了结束友好关系的边缘,但仔细观察,中美双方并没有决裂。首先,

随着美苏对抗的发展,国民政府对于美国的意义越来越重要;其次,美国没有找到在东亚的新战略伙伴。对美国来说,不管是继续进行的调停,还是对美援的冻结,都是以不与国民党闹翻为限度的。毕竟,在找到更新更可靠的东亚盟友之前,无论是美国还是马歇尔,还不想失去蒋介石这位政治上的伙伴和军事上的盟友。因此,五亿美元贷款在被冻结一年之后,当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遭遇困境时,贷款被再次提及。

参考文献:

- [1]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FRUS)*: 1946, Vol. 10 [Z].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 [2]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 [Z].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56.
- [3] 福雷斯特·C. 波格. 马歇尔传 [M]. 施旅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1.
- [4] 魏德迈论战争与和平 [M]. 台北:中正书局, 1989.
- [5] 秦孝仪. 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六·上册 [Z].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1978.
- [6]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三) [Z].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1981.
- [7] 特种兵的任务和努力的方向(1946年6月) [A].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2册 [Z]. 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社, 1984.
- [8] 黄修荣. 国共关系七十年纪实 [M]. 重庆:重庆出版社, 1994.
- [9] 古屋奎二. 蒋总统秘录:第14册 [M]. 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 1977.
- [10] *FRUS*: 1946, Vol. 9 [Z].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72.
- [11] 秦孝仪.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战后中国(一) [Z]. 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编印, 1981.
- [12] 姚嵩龄. 张公权先生年谱初稿 [M]. 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 1982.
- [13] 杜鲁门. 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 [M]. 李石译.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 1965.
- [14]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周恩来年谱 [Z]. 北京:人民出版社,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89.
- [15] 美五亿美元新借款交涉 [Z].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财政部档案, 全宗号(三)2, 案卷号 2752.
- [16] 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5册 [Z]. 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 1979.

收稿日期 2008—03—05

作者胡美, 南京大学历史系世界史专业博士生,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教师。

【责任编辑 池 豫】